

《左传》记事终止时间辨正

宁登国*

(聊城大学 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关于《左传》的记事终止时间,现在流行的《中国文学史》和《古代汉语》教材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一种认为迄于鲁悼公四年,即公元前453年。结合《左传》一书的自身性质、编写体例、行文风格、古书通例等因素综合考察,鲁悼公四年和有关战国预言史料并不能作为记事终止时间的根据。《左传》的记事年代是和《春秋》大体一致的,最终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但在流传过程中也间杂有一些战国史料。

关键词:《左传》;前468;前453;战国预言

中图分类号:K22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6)01-0005-02

关于《左传》的记事终止时间,现在流行的文学史和古代汉语教材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游国恩、袁行霈、章培恒等人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等,都主此说);一种则认为应迄于鲁悼公四年,即公元前453年(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等持此说)。除此之外,由于《左传》中杂有一些战国史事及预言,许多学者据此在对《左传》作者及成书年代的考察中认为,《左传》应成书于战国初期或中期。虽然《左传》的最终记事年代和《左传》成书年代是两回事,但他们对成书年代的断定无一不是以《左传》记事的最晚时间为成书年代上限的。较有代表性的如(仅记其时间上限):前403年说(杨伯峻等);前375年说(徐中舒等);前329年说(陈梦家等);前四世纪初说(朱东润等);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韩氏灭郑以后说(梁启超等);前四世纪五、六十年代说([日]新城新藏等)。本来看似十分明显且简单的《左传》记事终止年代,由于其中涉及了一些战国时事,却变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确定《左传》的最终记事时间,应该结合《左传》一书的自身性质、编写体例、行文风格、古书通例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而不是仅据其中的个别事件来断定。

《左传》是为解释《春秋》而创作的,是配合《春秋》的一部编年史,这已成为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春秋》用编年的体例记述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后人又续至十六年)(前479)共二百四十四年的历史大事。《左传》依经立传,也沿用《春秋》的体例和记事时间顺序丰富和补充了大量生动鲜活的历史事件。因此,《左传》的记事时间和《春秋》是大体一致的,只不过《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左传》为了将哀公在位的历史大事叙述完整,特延续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因此,根据《左传》的编年体例和解经性质,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应该就是《左传》记事的终止时间。

但是,为什么《左传》末尾又附记了鲁悼公四年晋国韩、赵、魏三家灭智伯之事呢?为什么《左传》还间杂有一些战国时期的史料呢?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左传》记事应终止于战国时期呢?由于对此问题的澄清,是弄清《左传》记事终止时间的关键,下面我们对此分别加以考察。

首先,《左传》最后附有一段百余字的“悼之四年”(即公元前453年)的尾巴。为分析方便,引录如下:

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鄢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弑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

这一段,如果孤立起来看,无论从编写体例上还是从行文风格上来看,都显得不伦不类,看似多余。因为《左传》的编写体例同《春秋》一样,是以年月日为纲将有关史料分列于某一年中集中叙述。当然,为增强叙事的完整生动,《左传》也往往将不在本年的事件穿插补叙,但这大都是对过去事件的倒叙,其典

收稿日期:2004-12-11

作者简介:宁登国(1972—),男,山东临沂人。山东聊城大学中文系讲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型标志就是以“初”字发端。另一方面，在行文风格上，这段前面写围郑之役，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似有详细陈述赵、知冲突之意。甚至连郑人的战前会议及鄢魁垒的被俘就义也要描绘一番。后面却惜墨如金，匆忙作结。这似与《左传》叙事摇曳多姿的风格迥异。

其实，若联系《左传》的整体叙事风格来看，这一问题则豁然开朗。因为《左传》的叙事多种多样，不仅有倒叙，还有预叙等，而且，《左传》的预叙（包括预言）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那就是每预必验。至于验辞的结果则表现形式不一，有的在预言后即交代，有的则置于应验之年交代。也正因为如此，左传预言才被研究者高度重视，并视为考察《左传》成书的最可靠证据之一。仔细分析上面引录的这一段，会发现其关键不是要记述晋阳之役，而是交代知伯之亡事。此段百余字，可谓句句都是围绕知伯而写：郑驷弘之设诱杀圈套，晋军之内讧分裂，知伯之贪愎不悟，都预兆着知伯之必亡。在这点上，其行文宕而有法，简练概括，与全书是一致的。

事实上，关于知伯必亡的预言见于《哀公二十七年》：知伯首次帅师伐郑时，郑求救于齐，齐陈成子因知伯诬告自己不恤祖国（“陈之不祀，郑之罪也”）和以陈亡为己利（“若利本之颠”）而预言说：“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陈成子对知伯的预言是《左传》众多人物预言之一。由于知伯被灭是在悼之四年（即公元前453），而《左传》记事止于哀公二十七年（即前468），故此事被置于最后交代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段看似突兀，实系《左传》预叙之通例。故此则叙事并不是侧重在记述晋阳之围，而是对前面陈成子预言的回应和交代。

因此，《左传》末尾的韩、赵、魏三家灭智伯之事，是对《哀公二十七年》陈成子预言的照应和交代，不能由此而改变《左传》整体的记事终止时间，即哀公二十七年。

关于《左传》中杂有的战国史料，如仔细考察则会发现，并没有涉及战国史事的直接记载，全是《左传》预言史料所间接反映的史事，以示其预言的灵验。涉及战国时的预言主要有下列几类，兹条列并举例如下：

1. 关于郑亡的预言：《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按：郑亡在公元前375年。

2. 关于岁星的预言：《昭公八年》：史赵预言“岁在鹑火”，陈国将亡；《襄公十九年》裨灶预言“岁在娵訾之口”，伯有将死。据日本新城新藏考证，此年应为公元前365年或稍后几年。

3. 关于秦的预言：《左传》文公六年：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按：秦自穆公以后，国势衰颓，至献公后期始复强大。故知此条应指公元前360年之前。

4. 关于卫亡的预言：《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昭公四年浑罕言“郑先卫亡”，按：卫亡于公元前330年。

5. 关于周的预言：《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按：周亡于公元前256年。

6. 关于田氏代齐的预言：《庄公二十二年》懿氏为嫁女于敬仲而占卜，卜辞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妣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按：“五世其昌，并于正卿”指的是前488年田成子专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指的是前379年田氏代齐。

7. 关于三家分晋的预言：《闵公元年》晋献公赐毕万以魏，卜偃预言“毕万之后必大……诸侯曰万民”，而辛寥则占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适晋，对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其将萃于三族乎！”按：三家分晋在公元前403年。

由以上预言可以明显看出，虽然《左传》中涉及了战国初期或中期的有关史事，但同前述知伯之亡一事一样，这些史事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也全都是同相关的预言相呼应的，是为了突显预言者料事如神之本领，更为了揭示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及编者劝善惩恶的价值取向。而且，这些战国史事预言仅间接反映了发生在春秋时期有关事件的最终结果，并没有进行具体叙述。因此，《左传》中涉及的战国史事对于考证《左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但并不能因此将《左传》的记事年代也推至战国。

事实上，先经口头流传再著之简帛，是先秦古书写定的一个通例（这和当时简陋的书写条件和文化传播方式有密切关系）。《左传》的出现，是王学渐废而私学渐兴时代的产物，其目的是为已经由鲁史记而变成儒家重要文献的《春秋》提供解释。但其最初的流传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代代口头传诵时期。清初顾炎武认为《左传》成非一时，作非一人，已经大体道出了《左传》成书的实际情况。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左传》的记事年代，许多问题就可豁然开朗。今天见到的那些涉及战国时代的史事，应该就是在口传的过程中加入的，而语言风格上接近战国的那些文字也应该是在写定时受到战国文风的影响而修改润饰的。

因此，我们说，《左传》主要采用春秋时代的口头传说、历史故事、人物言论、各国史料等来具体详细的解释《春秋》记事纲要。其记事年代和《春秋》是大体一致的，最终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但在流传过程中也间杂有一些战国史料。

（下转第4页）

诗中不仅记叙了典礼的仪式和歌舞场面，也记叙了祭者的感受和祝愿，因此它是祭事歌。经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不能说《九歌》是纯粹的祭祀歌或祭事歌。作为一场完整的祭祀仪式，场面、祭歌、道具、角色、情节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说是祭祀歌（楚郊祭歌或民间祭歌），是因为只看到了仪式中的祭歌成分；说是祭事歌，是因为过分强调了仪式中的故事情节和叙述性。

从《九歌》的直接源头出发，可以得知《九歌》是楚地原始文化与作者个体情感结合而喷薄出的美丽花朵，具有祭祀与祭事的双重性质。还是钱钟书先生说得好：“作者假借神或巫之口吻，以抒一己之胸臆。忽合而一，忽分而二，合为吾我，分相彼传，而隐约间参乎神与巫之离坐离立者，又有屈子在，如玉之烟，如剑之气。胥出一口，宛若多身，叙述搬演，杂用并施。”^{[14] (P599)}

参考文献：

- [1] 褚斌杰. 屈原研究[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2] 陈士珂. 孔子家语疏证[M]. 上海：上海书店，1941.
- [3] 刘宝楠. 诸子集成·论语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 [4] 焦循. 诸子集成·孟子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 [5] 刘向（撰），向宗鲁（校证）. 说苑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6] 刘向（编著），石英光（校释），陈新（整理）. 新序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7]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8] 茅盾. 茅盾说神话[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9] 何星亮. 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 [10]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1] 朱熹. 楚辞集注（卷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12] 姜亮夫. 屈原赋今译[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 [13]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礼记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4] 钱钟书. 管锥编（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5] 宗懔. 梦梁录·荆楚岁时记[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 [16] 过常宝. 楚辞与原始宗教[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Seeing the character of *Jiuge* from its direct source

ZHANG Yu-chun TANG 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direct source of *Jiuge* is not "the Book of Songs", not the ballads of Chu State, not the ancient mythology, but the intact sacrificial ceremony of Chu State. It can be proved from four aspects: On the content, they both express and perform the love; regarding the form, both end up with the tragedy; with the concern of role, the necromancers appear in them hold two duties; furthermore, both of them abstract the holy and pur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vanillas which were used as the props for sacrifice. *Jiuge* is a beautiful flower gushed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primitive culture of Chu State and author's individual indignation. It has a double nature of sacrificing for gods and sacrificing for things.

Key words: *Jiuge*; direct source; sacrifice for gods; sacrifice for things

（上接第 6 页）

The explanations on the last narrative time of Zuo-Zhuan

NING Deng-guo

(Chinese Department, Liaocheng University, Shando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views on the last narrative time of Zuo-Zhuan: the first is the twenty-seventh year of lu-ai-gong, that is, 468 B.C. the second is the fourth year of lu-dao-gong, that is, 453 B.C. According to integrated survey on the character, style, etc. in Zuo-Zhuan, the last narrative time of Zuo-Zhuan should be the twenty-seventh year of lu-ai-gong, that is, 468 B.C. But there also have some Warring States Period documents in the spreading process sometimes.

Key words: Zuo-Zhuan; 468 B.C.; 453 B.C.; Warring States Period; prediction